

《历史的海南》终于以精美的版式付梓面世了,序言中,作者钟业昌先生首先提出文史老料的概念,譬之以今之身价腾昂的花梨木老料,可谓精彩绝伦,由此揭示老料的精神价值,其境界变得更为醒目。越是容易复制的东西,越难以保留和传承。老料则相反,其中一个因素,即是它的不可再生性。叙述的原创性和史料的稀缺性相结合,此即是从“映照岁月的深邃”,到“洞悉历史的原始”。

原创性写作形成的动因,源于作者致力于海南历史文化的视野拓展,重新建构事物本质,沉甸甸的八篇长文,把研究相对贫弱的海南文化政经史迹的史论与史述,一下拉到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度。

历史往往以冰凉的统计数字出现,而在冰凉的数字后面,不知隐藏着多少鲜活的情怀故事。钟业昌先生活泼充沛的笔力,从容地将数字生命化,将概念具象化,因而极具牵动心灵的力量。

《宋子文还乡海南的前前后后》,关于宋子文回乡,运用社会学的微观法则,见微知著,一本最微小的历史事实也能感人至深的原则,那乡愁背后的海南人故事,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不仅是文件和档案,更有细民百姓万花筒般的生活,从这里去诠释历史事件,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。此种史学观,英国现代史家称之为“草根历史学”,意大利史学家金斯伯格则称之为“小虫转身的历史学”。

对细节的搜寻无远弗届,而在判断结果上,却又大处着眼。宋子文还乡一文,不但连当时记载于作业本上的史料都挖掘出来,更对他的整个行程,辅以国内国际形势的叙说,情景复原,丝丝入扣,宏观的视角审视历史,叙论的主题凝重而深刻。

史料的挖掘、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等重大问题,这就有了作者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,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,对史实意义的透析。

《谷牧与海南 1980-1987》属于当代史范畴,里面涉及大量的时间节点,稍一疏忽,叙述上即有可能成为一团乱麻,淘漏难度极大的写作。如果按照大事记的写法,时间明,但又会丢失很多旁证和佐证。业昌的头脑的明睿,在于他对史料强劲的驾驭能力。他以关键时间为桩点,其他众多时间节点为辅助,人与事互为经纬,把头绪纷繁的当代史叙述得波澜起伏,恣肆跌宕,而又井然有序,同时众多的新闻材料、旁逸斜出的背景事实点染佐证,仿佛郁郁的花架,主次分明,而又生机盎然。关于海南建设开放的事实背景,这样看似枯燥的史实,处理得扣人心弦,可读性极强。

《1829,百年好官云青天》也是以1829年为桩点,实际叙述所涉及的时间则将近两百年,钩沉种种参照系,对循吏云茂琦一生事功,作了淋漓尽致的解读,巨细无遗的圈点。

《1912,孙中山与海南改省风云》海南改省的曲折动议,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,关于此事的史料都显得凌乱、琐碎、幽僻,作者的功业,在于打撈,搜集,然后以罕见的归纳手腕,使历史事实放大到与原初经过同样清楚的像素,而与之环环相扣的国事与重大人事,片刻不离地提供参证,委实堪称还原历史的大手笔。

沉溺与升华,挖掘和发现,作者以海南第一流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,担当着复原历史、阐释历史的使命感。综观业昌的研究境界,一见其大,一见其广,一见其深。大是经验与推论的魄力阔大,广是眼界与视角的广远,深是他对海南乡梓感情的深厚。

种种论述充满铁板钉钉的实证,无懈可击的推论,整体过程力量充沛,往往以大迂回方式展开挖掘、辨析、推导和判断。笔力始终不稍衰。其引人入胜,然而,“蚕丛及鱼凫”,荆棘野卉乱花迷眼,倘无系统的眼光,博大的史识加以去芜存精、升华利用,则再多掌故也唯有“不才明主弃”,流于自生自灭一途,而业昌先生写史运用史料之繁复实属罕见。热门材料赋予新意,冷落者更是细加推求,至位置经营找到落点,令人顿生非它莫属之感。这得益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,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。傅斯年先生曾说,“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!”这是指散落的原生材料,具有还原真相与积淀人文的非凡价值。本书作者正是如此,他竭力扩充史料的来源,海量收集资料,《1949年,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》即从当时军政人物的日记、回忆手稿出发,反复比较疏证,从琐碎庞杂的浩繁原始资料中,寻绎大历史的必然性,由对原始材料所作的史学意义的全方位开发,直观认识整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。

虽非专业史学研究,但作为资深报人,他是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感与预见性来进行历史碎片的收集还原,来对古董般的史料作一番修复与刷新,来探询史料与史迹的因果勾连。对稀缺史料的研究整合,融入全新的眼界和思路,这和戏说历史的随意夸诞,盲翁做场般写史的囫圇吞枣有着本质的区别,有着根本的异趣。阐释的文化用心,更具有衔接今昔的现实意义。以敏锐的观察力刮垢磨光;普通公认大事而易见之史料,则以活泼新颖之解读,史迹因果连属复杂情事遂由隐而显。业昌先生的这种史学怀抱及眼光,诚如梁启超所说“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,历历如掌纹,真所谓俯仰纵宇宙,不乐复何如矣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第六章)。许多僻处一隅的史料,蒙尘已久,若非他的深度下潜式的挖掘,势必趋于冻结或走向湮灭,但是一经他的刮垢拂尘,呵护与阐释,仿佛重放的鲜花,又像珍珠般闪光,一则精气神全出,一则历史文化关怀的目标顿显。而作者的一番阐释推导,印证成一个个历史的画面和节点,这是海南的历史,历史的海南,家园的情怀,心灵的滋养。

该书虽只选录八篇文章,但是八篇长文分量超重,且已涉及汉朝、清朝、民国,直至当代的各节重大历史。著史者从纷繁的史实,不同的侧面,耀眼的人物,前人的事功等等方面,去复活海南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精神内核。作者一方面秉承史学“通古今之变”的传统,同时富有积极的现实意识和追求,在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流向之中,以及传统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中,来观察其对海南的影响。作者本有撰述海南源流史的宏愿,在此,我们不仅看到他到古代直至当代的历史线索分明、成竹在胸,而且对各节历史的定位与构建亦已登堂入室……

(本文原载于12月12日《羊城晚报》人文周刊)



《历史的海南》  
钟业昌著  
2010年10月海南出版社出版  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# 叩问岁月山河 洞悉历史原始

文/伍立杨

《历史的海南》以沉甸甸的八篇长文,把研究相对贫弱的海南文化政经史迹的史论与史述,一下拉到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度。

## 感受「老料」

文/钟业昌

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?花梨!

这几年中,是眼看着海南花梨价格飞一般地上飙。先是花梨木老家具,继之花梨木料,价格一路攀升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而不可收拾。尤其是“老料新作”仿古家具的大肆兴起,更使人们对稀缺的海南花梨老料趋之若鹜,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万金一斤的地步。天底下还有这么贵的东西么?

“海黄”老料以斤论价值万元,这并非天方夜谭,而是演绎于花梨迷们中一个个惊悚故事。吾辈未敢问津,却是久而久之,“老料”两字入耳入心,自是津津有味而乐为人道。想那“老料”,仿佛醇厚浓郁的味道袅袅而过,对岁月的眷恋居然在那一刻凝固而无所他顾。

“老料”,必定是这时代好此道者怦然心动的字眼,诚非时下酒友们好为炫耀的“年头”所能同日而语。何以见之?现在,你不妨将“老料”两字键入谷歌,就会赫然发现居然有2000多万条相关的信息。“老料”的朋友遍天下,真可谓洋洋大观了。

如此海量“老料”信息飘然而至,令人目不暇接,而又难以割舍。其实,也有过与“海黄”老料失之交臂的抱憾,乃至抱怨。心情归于平静,却是源于这样一种方式:忽然一天,翻翻书架上1914年版《琼游笔记》、1924年版《云南游记》、1954年版《漫记海南岛》、1959年版《刘坤一遗集》、1974年台湾版《陈济棠自传稿》、1982年香港版《李汉魂将军日记》等等,不禁自叹:这不也是“老料”吗?

是的,这是“老料”,是纸质“老料”。

“海黄”或“纸黄”,就这样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,满足着同样心理的需求。因为它们都有不含水分、不长虫子、不变形状等共同特点,十足的“盖棺论定”。原本木料于居室担心开裂,文字于阅读厌恶“水分”。那么“老料”呢?不分木质纸质,安静地在一旁,那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在这个浮躁与功利交织并发的时代,稍一抚摸就可以让心情蛰伏,信任与放心那一刻油然而生。

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原来如此简单,又如此在理。跋涉于海南历史源流的长途,原来是做了穷罗“纸黄”老料的事情,好似藏家四处搜寻“海黄”老料。如今,收集在《历史的海南》中的八件海南史作品,无不是以“老料”做成,也算是“老料新作”吧!这当中用“料”之多,原汁原味,当推《1829,百年好官“云青天”》。最初是从《刘坤一遗集》中发现这个海南先贤的价值,进而整理《阐道堂遗稿》这块老料,其光泽顿时四射,穿越时空,让你不能不喊出他是“海瑞第二”,他可能也是中国古代县官第一人。“老料”之多不影响阅读,而社会认同之强烈,超乎想象。不再含水变形的“老料”魅力,在21世纪绽放依然不可遮拦。

“老料”之弥足珍贵,在于轻轻除去污垢,不需打磨,就能映照岁月的深邃;细细拂去尘埃,稍加留心,就能洞悉历史的原始。“老料”生长出一种定力,让我们回望岁月山河,可以更加从容与坚实。不说正本清源,不说秉笔直书,至少要有一份事实才说一分话。所以,“我们实在不必给白沙门附加太多虚无的构造”,别让海南历史成为任人随意打扮的“小姑娘”(《白沙门怀古》);“终结民初海南改省进程的事情,不是宋案的发生,而是‘二次革命’的失败”(《1912,孙中山与海南改省风云》);宋子文首次还乡,“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开发海南的遗愿,而非为了攫取海南的资源;两天后他离开海南,是计划中的应李宗仁等人之邀前往广西视察,并非因为‘西安事变’的发生”(《1936,宋子文还乡海南的前前后后》)。

“老料”是失去生命的植物,又是有着生命的历史。“老料”岁月留痕,文脉灿然,愈久愈醇,以毋庸置疑的面目,面对来者。细心呵护、整理,让你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与感受。所以,写《1908,一项创兴海南宏大计划的夭折》,想到史上开发海南最为宏大的“一纲十目”计划的夭折,尤其想到“百业以资本为根源,而资本以银行为枢纽”、“银行为实业之母”这些深中肯綮之论,必然想到当世“海发行”的关闭,当然还想到“复活”海南商业银行时断时续的呼声。而写《1949,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》,深感历史真的不是历史学家的沙盘推演,当然也想到海南终能建省办特区的得来之不易,历史终有垂青海南的这一天。至于写《谷牧与海南 1980-1987》,从他1985年风尘仆仆南下处理“汽车事件”,每每想到后来1998年朱基南下海南处理“泡沫经济”的同样情景……历史沉重,历史惊人相似,大抵如此。

用“老料”写作,得对历史心存敬畏。固然可大胆设想,但终需小心求证。不然捉摸不透“老料”,就会造成遗憾。这在《汉武帝与海南开疆》中,是严重的表现。由于看“料”不透,以至直接误导了读者。至今想起仍觉汗颜。好在抛出的是“砖”,而引来的是“玉”,无意中受益匪浅,也为海南开疆史的深度研究作出了“贡献”,如此安慰始觉心安。

海南的历史隧道,说起来几乎与中华文明同其悠久。也是个“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于今”。放大历史的视野,让“老料”把我们带回历史的气场,就会发现,海南的历史天空同样宽广与多彩。只是文章合为时而作,《历史的海南》中的作品大都是“节点文章”,是兴趣所致、媒体所需的偶尔流露,就像滔滔江河中溅、而现的几朵浪花而已。

海南是中国地理的极南,也是中国历史的末端。为集子取名曰《历史的海南》,固然与读一本叫做《历史的台湾》的书相关,但其实是要消融一种久滞心底的纠结。或者这样说,在自建省以降就不绝于耳的海南是否“文化沙漠”的争辩声中,试图以“中国源、海南流”的叙述,心平气和地去了解更本原、更独特、更宏大的海南历史,当然也包括文化。没有历史何来文化?它们本来就如同同一枚硬币,是一体两面。

能做得好吗?这就留待诸位看官不吝评鹭吧。

(本文为作者为《历史的海南》所写的自序)